核心课程：普世教会史

第一讲：中国教会史

【祷告】

# 导论：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中国教会的历史？

中国教会的历史是一部扣人心弦的故事，这其中充满了无人能够预见的意外和转机。除了历史本身引人入胜的内容外，还有许多原因值得我们去研究这段历史，其中有四点与我们的主题密切相关。首先，中国约有7000万到9000万基督徒[[1]](#footnote-1)，如此庞大的规模让人不禁要问：“这事是怎样发生的？”[[2]](#footnote-2)“毛泽东的无神论中国如何成为这么多基督徒的家园？”其次，由于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巨大影响力，加上庞大的基督徒数量，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全球基督教信仰。第三，在中国教会建立和发展的前140年里，宣教士们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许多经验教训用于未来的宣教事工。第四，我们国会山浸信会与中国基督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有大约几十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教会成员、有回到中国的教牧实习生、有我们差派到中国的宣教士、有面向中国留学生的国际学生事工，以及数十位来自中国的基督徒领袖参加过我们的九标志周末研讨会。

在我们继续探讨之前有一个简要的说明。纯粹出于务实的原因，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历史视角仅限于中国的新教基督徒（不包括天主教或东正教）。除非特别说明，否则“中国教会”、“中国基督徒”等用词都仅用于指代新教。

# 中国教会历史

## 马礼逊

到19世纪初的时候，清朝统治中国已经有150年了[[3]](#footnote-3)。在这期间，中国实际上是对外国人特别是宣教士们关闭的[[4]](#footnote-4)。清政府禁止外国人访问中国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并以酷刑处死那些在中国劝人信教的外国人[[5]](#footnote-5)。

尽管宣教工作的大环境并不乐观，但一些西方基督徒仍然考虑移居中国传扬福音，因为在这个拥有3亿人口的国家里竟然没有一个基督徒，如此明显的缺乏开始激动西方基督徒的心。1803年，一个名叫马礼逊的英国工人怀着要去中国的抱负[[6]](#footnote-6)来到英格兰戈斯波特（Gosport）的宣教学院（Missionary Academy）学习。毕业后，他找到了一个住在伦敦的中国人教他两年中文[[7]](#footnote-7)。事实证明，这对马礼逊而言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预备，因为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环境会相当艰难。清政府禁止其国民教授外国人汉语，违者一经发现往往会酷刑处死[[8]](#footnote-8)。1807年，马礼逊曾寻求通过东印度公司前往中国，但遭到拒绝[[9]](#footnote-9)。结果，他只能先乘船航行80天抵达纽约，然后再从那里乘船113天到达中国广州[[10]](#footnote-10)。

1807年9月7日，马礼逊到达广州。到达后不久，他发现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先传福音还是先翻译圣经[[11]](#footnote-11)？马礼逊料定传福音会使他在短时间内就被驱逐出境，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将来每一个归信的中国人都需要圣经[[12]](#footnote-12)。因此，在到达中国后的几个月，马礼逊就开始翻译圣经[[13]](#footnote-13)。之后的27年，马礼逊一直殷勤地致力于中文基督教文字出版工作，这为后来的福音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1834年马礼逊去世时，他毕生大约只为10名中国信徒施过洗[[14]](#footnote-14)，但事实证明他的一生是多结果子的。他出版了第一部汉语系统语法书、一部三卷的中英词典、一本103问的教义问答[[15]](#footnote-15)以及一部中文圣经[[16]](#footnote-16)。

## 第一次鸦片战争

在马礼逊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从英属印度非法进口到中国的鸦片因给走私者带来暴利而数量剧增，这使得英国政府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日益紧张[[17]](#footnote-17)。到马礼逊去世时，鸦片瘾已经摧毁了200多万中国人的生活并且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痼疾[[18]](#footnote-18)。这个矛盾在1839年随着中英军事冲突彻底爆发，后来这次军事冲突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英国靠坚船利炮打败了古老而落后的中国，并在第一个所谓的不平等条约中获得了解决方案[[19]](#footnote-19)。这份条约中的两项条款将改变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进程：第一，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20]](#footnote-20)。（2）开放包括上海和广州在内的五个沿海城市作为通商口岸[[21]](#footnote-21)和外国人包括宣教士在内的永久居住地[[22]](#footnote-22)。

回顾历史，那些不平等条约是一个令人感到心情复杂的祝福。在西方人经营了几十年极具危害的鸦片贸易后，西方宣教士们通过其政府强加给清政府的一份条约得以进入中国。这一事实成为了中国基督徒身上沉重的枷锁，甚至这个影响到今天还在继续。这是一个可悲但又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同一个条约，本意上是借着鸦片生意合法化而打开中国市场，而同时也为借着宣教事工的合法化而打开了中国的海岸[[23]](#footnote-23)。尽管许多在华的西方基督徒一直谴责[[24]](#footnote-24)鸦片[[25]](#footnote-25)贸易[[26]](#footnote-26)，但要彻底地与鸦片贸易进行切割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当时搭乘鸦片船是进入中国内地的唯一途径。正如西方基督徒发现不可能把宣教与鸦片贸易完全切割一样，身为福音对象的中国人也常常无法将基督教的信息和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不道德行径区分开来。伟大的基督教来华宣教士杨格非（1831-1921）曾贴切地写到[[27]](#footnote-27)：“西方人在鸦片贸易中的参与使中国人更理直气壮地反对基督教……超过了宣教士们为基督教做的或者所能够做的美好的见证。”

## 太平天国之乱

作为不平等条约中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将香港割让给了英国[[28]](#footnote-28)。一些宣教士们开始在那里定居，其中有一位是浸信会的罗孝全（Issachar Roberts）。1847年，罗孝全花了几周时间陪伴一位精神不太稳定的人，此人名叫洪秀全[[29]](#footnote-29)，曾三次在科举考试中落第[[30]](#footnote-30)。与罗孝全的交流加上他阅读了梁发（中国第一位被按立的基督教牧师[[31]](#footnote-31)）撰写的福音小册子，洪秀全宣告自己认信基督。

1840年代末，洪秀全建立了太平天国，并制定了共享的土地政策（天朝田亩制度）、粮食配额、男女分离等许多严苛的规定[[32]](#footnote-32)。起初，西方宣教士们对太平天国及其迅速发展持褒扬的态度。然而到了1852年，当太平天国在圣经中增添《天命诏旨书》时，这一举动清楚地揭示了太平天国所持的信念并不是正统基督教[[33]](#footnote-33)。随着太平天国更多的举措出现，这一点也越发地明晰了。例如：太平天国坚持要求其新成员在三周内记住十诫，否则将会被砍头。同样地，若是被抓到在礼拜时吵闹、被发现通奸或者吸烟达三次者也会被砍头[[34]](#footnote-34)。

到1850年代中期，太平天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团体了，而是演变成了一场暴力的政治和武装起义。在1851年至1864年间，伪基督教性质的太平天国反清运动及其引发的残酷内战，夺去了2000万至3000万人的生命[[35]](#footnote-35)。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最后竟需要一位英国基督徒将军（戈登）率兵（常胜军）将非基督教的满清政府从伪基督教的太平军手中拯救出来[[36]](#footnote-36)。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诚然是西方人加在中国基督教身上的枷锁，然而太平天国运动或许会成为中国基督徒身上更重的担子。因为两个世纪以来，渴望稳定高于一切的中国领导人借着天平天国运动看到了不受监管的宗教具有潜在的破坏力。

## 戴德生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一年，一位病重的英国人从中国的宣教事工中抽身回国，为的是组织基督徒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去到中国传福音[[37]](#footnote-37)。尽管宣教活动在中国开展了50年，但是到1860年，只有351位新教徒和91位新教宣教士[[38]](#footnote-38)。在1865年6月末，戴德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创办了[[39]](#footnote-39)中国内地会（CIM）[[40]](#footnote-40)，这一举动将在19世纪末极大地改变这些数字[[41]](#footnote-41)。

内地会推动了一些在基督教宣教史上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政策：第一，成为一个“信心差会”， 戴德生反对向教会[[42]](#footnote-42)或个人募款[[43]](#footnote-43)。第二，戴德生派出的大多数宣教士是工人阶层的平信徒[[44]](#footnote-44)，而不是被授予圣职的神职人员[[45]](#footnote-45)。第三，戴德生坚持把穿本土化的服装[[46]](#footnote-46)作为宣教基本原则[[47]](#footnote-47)。第四，戴德生接受大量单身女性成为宣教士，并且差派她们中的一些人去乡村单独服侍[[48]](#footnote-48)。

在内地会创建后的几年里，戴德生透过写文章和四处演讲，努力唤起宣教士们去中国内地传福音的热情[[49]](#footnote-49)。到1880年，内地会的中国宣教士数量已经超过了其它西方差会宣教士的总数（100 比 96）[[50]](#footnote-50)。到1893年，中国已经有1323名新教宣教士[[51]](#footnote-51)。尽管戴德生承受着痛苦的健康问题[[52]](#footnote-52)，但他的大部分时间仍是在中国度过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已返回英国的戴德生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坚持最后一次回到中国。1905年6月1号，经历过两次丧偶、73岁高龄的戴德生抵达中国长沙。两天后他与世长辞[[53]](#footnote-53)。

## 义和团之乱

19世纪末，随着来华宣教士数量的激增，许多中国人逐渐视本土基督徒信教为一种危险的、不爱国的、受外国宗教势力影响的行为[[54]](#footnote-54)。到1899年初，西方人开始注意到当地人会成群结对地破坏城镇、并高举“扶清灭洋”的口号[[55]](#footnote-55)。许多号称是义和团的人身上挂着横幅，上面写着“奉皇帝命令消灭基督教”[[56]](#footnote-56)。随着暴乱的蔓延，外国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都成了义和团暴力攻击的对象[[57]](#footnote-57)。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许多人都因这场暴乱而指责宣教士[[58]](#footnote-58)。最终，八国联军镇压了这场叛乱并于1901年9月签订了一份条约，但在此之前义和团杀害了约3万名中国基督徒和200位外国宣教士[[59]](#footnote-59)，遇害者以天主教信徒居多[[60]](#footnote-60)。可悲的是，义和团之乱只是中国民众反对基督教的一个微小而凶恶的预兆，半个世纪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个预兆将得以完全实现。

## 本土基督教运动：宋尚节和倪柝声

就在西方军队因结束义和团之乱而缔结条约的当月，在中国诞生了一个人，他将成为中国福音布道事工最具活力的人物[[61]](#footnote-61)，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布道家[[62]](#footnote-62)。此人就是宋尚节，他于1901年出生于中国福建。在学术上很有天赋的宋尚节前往美国深造，并于1926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63]](#footnote-63)。毕业后，他渴望将来在中国做福音工作，所以他以全额奖学金去了纽约协和神学院[[64]](#footnote-64)。在神学院老师和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的影响下，宋尚节开始接受新派（自由派）神学的观点[[65]](#footnote-65)。宋尚节先是经历了一场情感上、心理上以及灵性上的危机，后来又参加了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14岁姑娘奥尔丁·奥特利（Uldine Utley）带领的奋兴会，最终他拒绝了新派神学。他烧毁了自己称之为“魔鬼之书”的那些自由派神学书，并当面对富司迪说：“你是属魔鬼的，你使我丧失了我的信仰。”[[66]](#footnote-66)

1927年10月，宋尚节回到中国[[67]](#footnote-67)。1931年，一位名叫计志文的中国基督徒组建了伯特利布道团并邀请宋尚节担任布道团带领[[68]](#footnote-68)。这群人足迹遍布中国各地，所到之处宋尚节都以强烈的情感和富有戏剧性的风格进行布道。这种风格虽然冒犯了许多宣教士较为平静的布道传统，但却吸引了无数中国人的想象力。例如，为了讲述圣经中乃缦在七次下水后麻风病得治愈的故事，宋尚节七次跳下讲台[[69]](#footnote-69)。宋尚节带领的伯特利布道团的奋兴会也以医治神迹和传讲信心为特色，这源自于20世纪初的美国五旬节派。例如，一位宣教医生讲述了当年一个小男孩得医治的故事。在1930年代早期的伯特利布道团服侍中，一个小男孩看起来好像得到了医治。他回忆说：“宋博士告诉他必须说‘我能看见’，否则就是缺乏信心，他就永远不能看见。”[[70]](#footnote-70)

伯特利布道团的医治和福音事工越来越受欢迎。1931年到1935年间，伯特利布道团巡行了50000多英里，访问了133个城市，举行了近3400场奋兴会[[71]](#footnote-71)。仅一年，他们就举行了1199场奋兴会，其成员向13个省和65个城市的425980人布道，据报告有18118人信主[[72]](#footnote-72)。

当宋尚节和伯特利布道团通过奋兴会扩展本土基督教时，一位名叫倪柝声的中国牧师建立了“基督徒聚会处”，他一直呼吁信徒追求圣洁和脱离宗派制度。倪柝声于1903年出生于中国广东汕头的一个基督徒家庭[[73]](#footnote-73)。1920年，倪柝声在中国第一位家喻户晓的女布道家余慈度带领的布道会上信主[[74]](#footnote-74)。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倪柝声开始着迷于普利茅茨弟兄会的教导、司可福的经典时代论神学[[75]](#footnote-75)、凯锡克丰盛生命教导（Keswick higher life teaching）[[76]](#footnote-76)以及神秘主义——例如盖恩夫人(Madame Guyon)——的著作[[77]](#footnote-77)。1928年，倪柝声出版了他最著名的书籍《属灵人》，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神秘主义者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 Lewis） 及其作品《魂与灵》中的理念[[78]](#footnote-78)。

到1930年代初，倪柝声的追随者开始迅速增加，他开始借自己的声望去谴责各个宗派，视其为从西方宣教士而来的、毫无益处的舶来品[[79]](#footnote-7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约在同一时期，倪柝声创建的“小群”开始迅速发展。这个围绕着倪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聚会处体系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教会成员唱的是普利茅茨弟兄会的赞美诗《小群诗歌》（*Hymns for the Little Flock*）。到1933年底，倪柝声宣称已经有超过100个的小群教会聚会处[[80]](#footnote-80)。在30年代期间，倪柝声继续出版书籍并传道，尽管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1937-1945）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和逼迫，但倪柝声的事工和小群教会的事工仍然得到极大的发展。[[81]](#footnote-81)

## 三自爱国运动

19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中日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国陷入了残酷的内战中。一方是在1912年将清政府赶下台的国民党，另一方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最终共产党赢得了战争，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像之前的历代帝王一样，共产党坚持监视宗教生活，要求各信仰团体向政府登记其活动场所和神职人员。这种本能源于当权者对稳定的渴望，以及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宗教运动演变成政治叛乱的教训。（例如：14世纪50年代的白莲教起义，1813年八卦教起义，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82]](#footnote-82)，以及19世纪中期的回民起义[[83]](#footnote-83)）。

1950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宗教和国外势力控制的背景下，作为共产党员的基督徒吴耀宗（Y. T. Wu）和其他18位本土教会领袖前往北京，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会晤。在这些讨论中，与会的基督徒承认了与帝国主义纠葛的历史，并承诺要摆脱任何残余的外国关系[[84]](#footnote-84)。在一份体现了基督教自由派神学[[85]](#footnote-85)的、名为《三自革新宣言》的文件中写到： “认清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罪恶；承认帝国主义曾经利用过基督教；从基督教内部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要警惕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企图用宗教来扶植反动势力的发展。”[[86]](#footnote-86)

1951年，吴耀宗在北京召集了一批基督徒，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了作为官方机构的“三自爱国运动”（TSPM）的运作[[87]](#footnote-87)。“三自”一词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当时美国公理会海外宣教部（美部会）和英国宣教会的负责人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对中国本土教会发展的目标：自治、自养和自传[[88]](#footnote-88)[[89]](#footnote-89)。虽然表面上是宗教机构，但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有很高的政治目标。事实上，发起该组织的委员会曾公开地提出了其共产主义政治目标，并自称为“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改革运动筹备委员会”[[90]](#footnote-90)。

三自成立后，政府加快了对三自以外的基督徒领袖有计划、有步骤的迫害。到1955年，这些领袖中的绝大多数人要么被监禁、要么受到严厉公开的抨击、要么逃到国外[[91]](#footnote-91)。在采取这些行动时，政府往往用基督徒欺诈、叛国或者以其它一些非宗教的罪名对忠心的教会领袖进行控诉，试图维护宗教自由的外衣[[92]](#footnote-92)。由于共产党在这方面的不遗余力，到1950年代中期，真正称得上“三自”的三大独立华人教会运动都在衰落，因为他们的领袖大多都已经被政府监禁起来了[[93]](#footnote-93)。

## 逼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1950年代末的时候，三自加速了对基督教的控制，但它仅仅反映了共产党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生活日益严厉的管控。

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这次运动被称之为“大跃进”（1958-1961），为的是寻求国家迅速工业化和集体化。大跃进强制性建立了农村公社，将私人农业定为犯罪，并加强了宗教迫害。政府关闭了剩余的90%以上的教堂，并押送牧师们到田间劳改。仅在1958年，大跃进就关闭了2万多座教堂[[94]](#footnote-94)。到1960年左右，三自加强了对少数仍然开放的公共教堂的控制，导致了这些教会中的基督徒大批离开，并催生了所谓的“家庭教会”运动[[95]](#footnote-95)。

毛的宗教政策破坏了教会，同时他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一场灾难性的饥荒。在饥荒和政治迫害的共同夹击下，仅在三年内，毛泽东的大跃进就造成至少3000万人死亡[[96]](#footnote-96)。由于许多同住的人死亡，政治犯和宗教犯在劳改营中经历了最为严重的痛苦。然而，福音透过那些活下来的人显著地传播开来[[97]](#footnote-97)。

大跃进惨败后，毛泽东发现自己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1966年，大跃进结束五年后，毛泽东策划重新掌权并要在政府中清除温和派影响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他呼吁中国的年轻人加入到红卫兵的队伍里，清除任何疑为不忠于毛泽东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人。这导致了在学校、村庄、文化机构里甚至家庭成员之间难以计数的批斗会和暴乱。结果，大范围的混乱、猜忌和暴力接踵而至。毛的文化大革命以一种贻害无穷的扭曲，将孩子置于与父母对立的位置上，这导致了家庭结构的削弱。到1966年底，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致使所有的教堂关闭[[98]](#footnote-98)。1960年代末，毛泽东制定了一项全国性的政策：清除所有的宗教信仰[[99]](#footnote-99)，最后甚至关闭了三自[[100]](#footnote-100)。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仅文革期间就有大约100-300万人死亡，还有差不多同样多的人受到了永久性伤害[[101]](#footnote-101)。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毛泽东生命的最后2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宗教迫害最严重的时期[[102]](#footnote-102)。从1967年到1977年，虽然这十年对于中国教会而言基本上是一个没有任何文件、统计数据等资料的历史黑洞[[103]](#footnote-103)，但未来的岁月会毫无疑问地证明：教会在这段时间里有着相当大的发展。

## 改革开放

毛泽东去世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一个向西方开放和放松内部控制的时期随之而来。许多教堂重新开放，三自再次出现并试图管理中国的基督教教会。到1970年代末，基督徒人数迅速增长，共计约有500-600万人[[104]](#footnote-104)。回顾文化大革命这段最黑暗的时期，很明显基督教会的规模在这期间增长了三到六倍左右[[105]](#footnote-105)。

## 现今

从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到今天，教会在持续不断地发展。审视中国基督教现在的局面，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对比：第一，合法的与非法的。1982年3月发布的中央19号文件阐明了三自的官方政策：拒绝未登记的家庭教会，并要求全国所有基督教教会进行加入三自的登记[[106]](#footnote-106)。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城市，政府倾向于不对未注册的教会进行严厉打击，除非他们一次聚会的人数超过150-200人[[107]](#footnote-107)。第二，国内的与国际的。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其公民不能与外国人混在一起做礼拜。因此，中国公民不应该参加国际教会，不论这间国际教会是否已经在三自注册。

在研究地下状态的家庭教会时，虽然其组成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政府的管制带来一些共同特点。尽管作为非法教会所带来的后果不胜枚举，但有一些常见的后果：（a）由于教会受到规模的约束，很难支持全职牧者，这意味着教会需要依赖带职事奉的牧师。但他们的时间有限，这使得像讲道和门训这样基本的事工都难以维持。对于能够支持一个全职牧师的教会来说，通常有多个聚会点，这就意味着牧师不能花很长时间与一个地方的会众交流和建立关系。（b）租房难。（c）无力购买房产。（d）邀请别人到教会的困难和谨慎。第二，缺乏训练。家庭教会的领袖们接受神学训练的方式有：承认主日学、在香港等地的暑假项目、学生一次去某个大城市待几周的地下神学院，以及通过像戈登-康维尔等神学院开设的网络中文课程进行学习。尽管如此，中国神学教育的整体质量和有效性远远落后于其他较开放的国家。

# 总结

## 从中国教会历史学到的功课

尽管中国教会今天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它的历史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教会在敌对环境中中坚忍甚至成长。我们可以从过去200年的中国基督教中学到很多东西，但有几点格外突出。

**第一，与中国文化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很重要。**西方政府的丑恶行为使得中国人民对西方宣教士有着负面的印象，这导致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传教都很困难。一位曾在内地会服务过三代宣教工人的女裁缝曾经说，“如果上天堂就是永远与外国人交往，那么这样看来悔改和得救并没什么吸引力。”[[108]](#footnote-108)

**第二，自由派基督教无法在迫害中生存。**在毛泽东将外国宣教士从中国清除出去前的三十年里，许多西方基督教自由派人士来到中国传播他们的神学。然而，当1978年中国重新开放后，自由派宣教士很少回来，而福音派基督徒却大量涌入中国[[109]](#footnote-109)。毛的迫害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摆脱了神学上的自由主义。

**第三，对于教会来说，迫害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尽管毛在文革期间试图消灭中国的基督教，但是教会在这段强烈的迫害时期以发展壮大而告终。

**第四，现代世俗化理论是错误的。**著名无神论者丹尼尔·C·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于2015年4月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宗教的未来一片黯淡》（*Why the Future of Religion is Bleak*）的文章，文中指出，“几乎没有任何显著的例外，只要人类的安全和福祉得到提升，宗教就会衰退。”然而中国，更不用说韩国和部分非洲国家，提供了引人注目的反面例子。

**第五，神学训练的重要性。**对当地信徒进行神学训练而不仅仅是传福音使其信主，这对地方教会的长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在宣教的第一个世纪，由于总体上缺乏神学训练，导致出现了许多贫血的本土宣教运动，并且催生出很多异端和错误教导。

1. Rodney Stark, *A Star in the East: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West Conshohocken, PA: Templeton Press, 2015), 11. [↑](#footnote-ref-1)
2. Bruce Baugus, “Introduction: China, Church Development, and Presbyterianism” in *China’s Reforming Churches*, ed. Bruce Baugus (Grand Rapids, MI: 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 2014), 1. [↑](#footnote-ref-2)
3. Daniel Baye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2), 22. [↑](#footnote-ref-3)
4. Samuel Hugh Moffe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Volume II 1500-1900*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86. [↑](#footnote-ref-4)
5. Moffett, 287. [↑](#footnote-ref-5)
6. Christopher Hancock, *Robert Morrison and the Birth of Chinese Protestantism* (New York, NY: T&T Clark, 2008), 19. [↑](#footnote-ref-6)
7. Bays, 43. [↑](#footnote-ref-7)
8. Baugus, 30. [↑](#footnote-ref-8)
9. Bob Davey, *The Power to Save* (Carlisle, PA: EP Books, 2011), 43. [↑](#footnote-ref-9)
10. Hancock, 35. [↑](#footnote-ref-10)
11. Davey, 36. [↑](#footnote-ref-11)
12. Moffett, 288. [↑](#footnote-ref-12)
13. Bays 43. [↑](#footnote-ref-13)
14. Lian Xi, *Redeemed By Fire: The Rise of Popular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7 [↑](#footnote-ref-14)
15. Robert Morrison, “Appendix A: Robert Morrison’s Catechism (1811)” in *China’s Reforming Churches*, ed. Bruce Baugus (Grand Rapids, MI: 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 2014), 309. [↑](#footnote-ref-15)
16. Bays 44. [↑](#footnote-ref-16)
17. Bays 47. [↑](#footnote-ref-17)
18. Moffett, 297. [↑](#footnote-ref-18)
19. Bays, 47. [↑](#footnote-ref-19)
20. Bays, 48. [↑](#footnote-ref-20)
21. Xi, 19. [↑](#footnote-ref-21)
22. Bays, 48. [↑](#footnote-ref-22)
23. Moffett, 197. [↑](#footnote-ref-23)
24. Moffett, 290. [↑](#footnote-ref-24)
25. Bays 47. [↑](#footnote-ref-25)
26. Moffett, 464. [↑](#footnote-ref-26)
27. Moffett, 473. [↑](#footnote-ref-27)
28. Bays, 48. [↑](#footnote-ref-28)
29. Xi, 21. [↑](#footnote-ref-29)
30. Bays, 53. [↑](#footnote-ref-30)
31. Moffett, 293. [↑](#footnote-ref-31)
32. Xi, 81. [↑](#footnote-ref-32)
33. Moffett, 299. [↑](#footnote-ref-33)
34. Moffett, 299-300. [↑](#footnote-ref-34)
35. Baugus, 2. [↑](#footnote-ref-35)
36. Moffett, 300. [↑](#footnote-ref-36)
37. Davey, 101. [↑](#footnote-ref-37)
38. Moffett, 463. [↑](#footnote-ref-38)
39. Moffett, 465. [↑](#footnote-ref-39)
40. Davey, 107. [↑](#footnote-ref-40)
41. Davey, 105. [↑](#footnote-ref-41)
42. Davey, 86. [↑](#footnote-ref-42)
43. Davey, 108. [↑](#footnote-ref-43)
44. John Pollock, Hudson Taylor & Maria: *A Match Made in Heaven* (Ross-Shire, Great Britain: Christian Focus Publication, 2008), 140. [↑](#footnote-ref-44)
45. Bays, 68. [↑](#footnote-ref-45)
46. Davey, 110. [↑](#footnote-ref-46)
47. Bays, 68. [↑](#footnote-ref-47)
48. Bays, 68. [↑](#footnote-ref-48)
49. Pollock, 147-158. [↑](#footnote-ref-49)
50. Moffett, 467. [↑](#footnote-ref-50)
51. Moffett, 473. [↑](#footnote-ref-51)
52. Davey, 117. [↑](#footnote-ref-52)
53. Davey, 134. [↑](#footnote-ref-53)
54. Xi, 32. [↑](#footnote-ref-54)
55. Moffett, 484. [↑](#footnote-ref-55)
56. Davey, 132. [↑](#footnote-ref-56)
57. Bays, 84. [↑](#footnote-ref-57)
58. Moffett, 484. [↑](#footnote-ref-58)
59. Bays, 85. [↑](#footnote-ref-59)
60. Moffett, 486. [↑](#footnote-ref-60)
61. Bays, 137. [↑](#footnote-ref-61)
62. Xi, 141. [↑](#footnote-ref-62)
63. Bays, 138. [↑](#footnote-ref-63)
64. Xi, 139. [↑](#footnote-ref-64)
65. Xi, 139. [↑](#footnote-ref-65)
66. Xi, 140-141. [↑](#footnote-ref-66)
67. Xi, 141. [↑](#footnote-ref-67)
68. Bays, 137. [↑](#footnote-ref-68)
69. Xi, 144. [↑](#footnote-ref-69)
70. Xi, 147. [↑](#footnote-ref-70)
71. Bays, 137. [↑](#footnote-ref-71)
72. Xi, 136. [↑](#footnote-ref-72)
73. Xi, 156. [↑](#footnote-ref-73)
74. Bays, 132. [↑](#footnote-ref-74)
75. Xi, 169. [↑](#footnote-ref-75)
76. Xi, 163. [↑](#footnote-ref-76)
77. Xi, 176. [↑](#footnote-ref-77)
78. Xi, 165. [↑](#footnote-ref-78)
79. Bays, 133. [↑](#footnote-ref-79)
80. Xi, 170. [↑](#footnote-ref-80)
81. Xi, 194. [↑](#footnote-ref-81)
82. Bays, 159. [↑](#footnote-ref-82)
83. Liao Yiwu, *God is Red* trans. Wenguang Huang (New York, NY: HarperOne, 2011), 4. [↑](#footnote-ref-83)
84. Bays, 161-162. [↑](#footnote-ref-84)
85. 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Washington, DC: Regency Publishing, 2006), 152. [↑](#footnote-ref-85)
86. Bays, 158. [↑](#footnote-ref-86)
87. Bays, 163. [↑](#footnote-ref-87)
88. Bays, 160. [↑](#footnote-ref-88)
89. Xi, 17. [↑](#footnote-ref-89)
90. Bays, 164. [↑](#footnote-ref-90)
91. Bays, 165. [↑](#footnote-ref-91)
92. Bays, 165. [↑](#footnote-ref-92)
93. Brent Fulton, “A Tale of Two Churches?” in *China’s Reforming Churches*, ed. Bruce Baugus (Grand Rapids, MI: 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 2014), 182. [↑](#footnote-ref-93)
94. Xi, 202. [↑](#footnote-ref-94)
95. Bays, 176-177. [↑](#footnote-ref-95)
96. Bays, 194. [↑](#footnote-ref-96)
97. Bays, 176. [↑](#footnote-ref-97)
98. Xi, 202. [↑](#footnote-ref-98)
99. Xi, 204. [↑](#footnote-ref-99)
100. Bays, 185. [↑](#footnote-ref-100)
101. *Mao's Last Revolution* (2006); *Mao: The Unknown Story* (2005) [↑](#footnote-ref-101)
102. Bays, 176. [↑](#footnote-ref-102)
103. Bays, 185. [↑](#footnote-ref-103)
104. Bays, 186. [↑](#footnote-ref-104)
105. Bays, 186. [↑](#footnote-ref-105)
106. Bays, 190. [↑](#footnote-ref-106)
107. 对GY的访谈。 [↑](#footnote-ref-107)
108. Xi, 7. [↑](#footnote-ref-108)
109. Michael M, “A Brief History of the Western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Mission to China” in *China’s Reforming Churches*, ed. Bruce Baugus (Grand Rapids, MI: 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 2014), 56. [↑](#footnote-ref-109)